

中共內政與外交之辯證關係

楊 開 煌*

中共的外交政策在八〇年代以前，深受馬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出現「一面倒外交」、「革命外交」、「反霸外交」等政策；八〇年代之後，中共進行「改革、開放」政策，其外交政策受此影響，而有「經濟外交」和目前的「國家利益外交」的新政策取向。問題是當中共邁向「正途」之際，西方世界又開始擔心這是「黃福」呢？還是「黃禍」？

前 言

中共作為一個國家來看有許多人會給於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中共是一個沒有希望國家^(註一)，是一個黑洞^(註二)，但是絕大多數人認為中共是對國際事務具有影響力的強國^(註三)，事實上，以中共的土地面積、人口、資源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等各種條件來看，不論中共是強、是弱都將對亞洲地區發生重大的影響，不同的是，如果中國是弱國，以致是分裂的國家，則其影響的層面比較小，反之，如果是一個強國其影響力自然大增，如果是一個社會主義「強國」，他對週邊，以致世界局勢的影響如何，如果是一個富

* 本文作者係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註 一：黃文雄，中國解體論，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民八一年十一月；黃昭，日落中國一走向滅亡的中華帝國，揚笑軒譯，同上，民八一年十一月。

註 二：彭明敏教授于八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東吳大學演講。

註 三：John Franklin Copper, China's Global Rol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 一九八〇，頁一。

東吳政治學報／民國八十三年／第三期／頁187-217。

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影響又將如何呢？

我們如果依據前一個假設作為推論的基礎，則就沒有「強國」和「富強」的問題，同時也可以從中共的資料中抽繹出許多證據，來片面地證明「中國無望論」，然而站在台灣的立場，我們不能忽視中共萬一強大起來的可能性，屆時再作應變就陷入被動。所以我們寧可高估對手，以便我們能釐定清楚而明確的因應之道。特別是自從八〇年代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其經濟的發展確實令人刮目，當然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註四）制度適應（註五）思想調整（註六）的困難，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需警覺到中共在經濟方面學習的能力、調適的能力（註七），總之，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是越來越成為西方國家討論焦點。（註八）

本文的目的即在討論中共建立政權以來，中共外交政策與內政政策上的辯證關係，特別在「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共產生巨大變局的情況，中共的外交走向，西方世界對中共的看法，以及中共因應之道。

壹、中共之內政與外交之辯證關係

（一）意識形態教條主義時期

中共自五〇年代建立政權開始，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便是中共一切施政的指導思想（註九），根據馬列主義的設想，在內政上主張以「專政」來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以「階級鬥爭」來清除黨內外的敵人，以「馬列主義思想」統治全部的上層建築，透過獨佔的「政治社會化」的管道，塑造社會主義新

註 四：例如通貨膨脹、貪污腐化、不熟悉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等。

註 五：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專制政制和經濟發展的調適等。

註 六：如經濟特區的發展，姓資、姓社的問題，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引進西方經濟思想、管理思想的問題。

註 七：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如「政企分開」制度設計等。

註 八：見本文第三部分，中國威脅論。

註 九：參見中共一九五四年憲法序言。

人^(註十)，在經濟上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全力建設社會主義強國^(註十一)，因此在外交上根據中共的說法「分成兩方面：一方面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我們在鬥爭營壘上屬於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鬥，另一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敵視我們的，我們同樣也要敵視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註十二)，所以當時的外交政策在本質上就是敵視美國，和美國作針鋒相對的對抗，而且建立「反美帝」的統一戰線^(註十三)。

這時期是中共意識形態在全中國的建立時期，由於國內的主要敵人——國民黨已經不構成威脅，是以在外交敵視一個意識形態相反的大國，攻擊一個大國為抗美援朝運動，事實上就是一種以外敵來鞏固自我的統治手段，這一個時期可以說內政和外交都集中表現為支持社會主義反對帝國主義。

五〇年代末到六〇年代初，受到強烈的意識形態教育的使命感，先是中蘇共之間發生齟齬，毛澤東反對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提出的「三和兩全」^(註十四)的新主張，認為是違背了馬列主義的原則，不過衝突並沒有公開，一九五八年美、蘇兩國領袖在美國大衛營舉行高峰會談，正式實行「和平共存」的構想，而且此後不斷地召開談判，一九六三年美蘇簽訂了部份核禁試，限武談判也次第展開，對國際的緊張局勢有了一定的和緩作用，但是此一形勢對中共而言，是很難理解的，六〇年代的初期，中共與印度發生領土爭執，中共出兵打敗印度，但中共國際形象可以說是十足的「侵略者」。

在這一段時期，中共對內實行「三面紅旗」企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註十：Charles Paul Ridley, Pcuil H.B. Godwin Dennis J. Doolin,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California: Standlard University, 一九七六年，頁二四～六八。

註十一：參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三月。

註十二：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二。

註十三：Peter V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ed. 一九七〇年，頁二八。

註十四：「三和」是指和平共存、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就是要放棄了以革命赤化世界的唯一道路。「兩全」：全民黨、全國家，這是要放棄了階級鬥爭為綱領的路線，中共對此十分不滿。

社會，雖然在事實證明失敗之後，中共一方面在經濟上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實施「三自一包」以求渡過經濟難關，但是在意識型態上仍然大力推行「四清」運動，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終至發生文化大革命，全面地、徹底地清查任何可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根源及代理人等，這裡所突顯的就是馬列主義的極左思想，而在外交上也同時反映出極左的、教條的思想。一九六三年中共公開批評蘇共^(註十五)，兩黨之間已進行了長期的意識形態鬥爭已就表面化，反映在外交路線上就是中共爲了堅持自己在馬列主義上正統性和正確性，是以在外交上就是既反美又反蘇的兩面作戰，當然中共深知此一策略的可行性，因此決定了以分化民主陣營，煽動亞、非、拉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以便在民主國家的後院點火；在共產陣營中，以理論鬥爭爲武器攻擊「蘇修」，打擊其領導威信，以建立北京爲中心的國際共產運動。對應此部份中共的作法是用錢收買各國共黨中的毛派，唆使其與原來的共黨分裂。當時中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論」作爲其外交的指導理論，所謂「兩個中間地帶」爲指：這個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這是第一個中間地帶；另一部分是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這是第二個中間地帶。第二個中間地帶的國家有兩重性，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既剝削和壓迫別人，同時又受到美國的控制、干涉和欺負。因此，它們力圖擺脫美國的控制。在這方面，它們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人民有共同點。^(註十六)中共的策略是爭取兩個中間地帶的國家來「反美、反蘇」。

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國巴黎發生「學生、工人的暴動」，號稱「黑色五月」高舉「三M」的旗幟，其一爲毛澤東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件」之後，蘇聯被中共扣上「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將之與「美帝」並列

註十五：蘇共領導同志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的公開，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

註十六：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註十七：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紅旗雜誌，一九六五年，第七期。

註十八：同註一二，頁四八。

爲主要敵人。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月中共與蘇共在烏蘇里江發生「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率華沙公約國在中蘇邊境佈下重兵。同時從一九六五年開始中共大力支援北越南侵與「美帝」對抗，中共在外交上、戰略上都處兩面夾擊的危險中。在內部，自從六〇年代中期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也反映爲對外推行革命外交，使中共在國際間陷入絕對的孤立。其後到了「九大」林彪將這一段時間的外交稱爲「革命外交」，聲稱在外交上要「反美帝、反蘇修、反各國一切反動派」。^(註十九)這種純意識形態的外交後來被周恩來斥爲「左思潮干擾了中國對外政策」^(註二〇)。

在這個廿年中，意識形態顯然是中共外交的全部思想，強調國際主義，強調馬列主義的純淨性。然而這一段意識形態教條主義的內政措施與外交政策顯然都沒有給中共帶來任何太多的好處。

(二)意識形態實用主義時期—政治外交

七〇年初在中國大陸文革的武鬥雖已結束，但在內部又發生「林彪事件」，之後中共在大陸掀起一連串政治運動，一方藉以清除林彪的黨羽舊部，一方面「四人幫」得以傳播他們的意識形態；由於「四人幫」和林彪集團同爲在毛澤東的扶持之下成長的派系，因此，其意識形態是完全一致，因而「四人幫」掌控中共中央之後，實行一套更左的馬列主義，以便說明林彪的錯誤爲右傾的錯誤，所謂「右傾」依中共的術語來說就是「投降主義」的錯誤，這是絕對不可以原諒的。從而「四人幫」在經濟上提出「捉革命、促生產」，在農業上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教育上實行「三三制」，由工農兵上講壇，主張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讀書無須考試，入學只重身份。一切以「政治掛帥」，寧「紅」不專，在這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可以說完全鑽進馬列的死胡同之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年底鄧小平鬥敗華

註十九：林彪，「九大」政治報告，一九六九年九月。

註二〇：同註十八。

國鋒之後才開始全力糾偏，所以在整整八年（指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時間，在大陸內部無論任何政策，都是以極左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依據。

然而在七〇年代的外交作為上卻不相同。

首先是由於在六〇年代末開始，蘇聯對中共的威脅顯然加大，雙方在邊境上陳有重兵，兩國的矛盾加重、衝突昇高。毛必須突破此一困境。

其次是美國總統尼克森提出「低盪」政策，主張以談判代替對抗，爲了結束越戰，也爲了聯合中共對抗蘇聯，主動與中共搭橋。

遂使毛轉變其外交策略，採取「聯美自保」，並且重返國際社會，擴大蘇聯用兵的顧忌。先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紅旗雜誌刊出「論政策」乙文，強調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必須善用此一武器，要以「革命的兩面政策打破敵人的反革命兩面政策」，要把他們中間的「一切鬥爭、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爲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註二一）有了這種教育和認識之後，中共在外交上決定加強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以及美、蘇與中間地帶的矛盾，而在「美、蘇」兩國中，中共得出「美國現時沒有進行侵略的威脅」，而莫斯科現在是：「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其威脅比華盛頓大得多，直接得多」，故而在兩面革命的情勢下，目前應該側重反蘇，但也沒有放棄「反美」（註二二），而在「中間地帶」部份則加強拉攏，並挑撥中間地帶與美、蘇之間的關係，但是在此種國際佈局的變化之下，原來的「中間地帶」理論就出現不足之處，如此先近工業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矛盾無法顧及。因此在實踐的過程中逐步發展出新的理論；即「三個世界論」，此一理論是毛澤東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同一位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談話時指出，後經周恩來的闡釋，同年的四月十日由鄧小平帶上核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正式宣佈（註二三），其後到一九七九年中共在外交上仍然以「三個世界論」爲決策的依據。此一理論背後就嚴肅地預設「放棄馬列教條主義爲立場，將世界劃爲兩個陣營（資本主義

註二一：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北京：紅旗雜誌社，一九七一年，第九期。

註二二：昆明文件第四一～四三號，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註二三：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

與社會主義)的界限打亂，而把美、蘇兩個意識形態的敵對者劃成同一部份屬第一世界，其他亞、非、拉等經濟落後不發達的國家為第三世界，中共自己一再強調他們也是第三世界的乙員，而夾在二個世界中間的為「第二世界」，這是依照國家的經濟、財富、大小、強弱的標準來區分。當然所謂「三個世界論」雖然在認識世界方面放棄了馬列教條主義，不過在戰略目的上仍是「馬列」的。而且帶有反帝的色彩。只是在手段上變成可以聯合非馬列主義，甚至是反社會主義的國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七〇年代中共在外交上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已經由馬列主義的教條主義轉而為馬列主義的實用主義，這個由毛澤東親自決定而由周恩來執行的外交政策，顯然和「四人幫」主導的內政使用了不同的論據。此一變化促使得在七〇年代中共的內政變化和外交的收獲、成就變得無法理解。換言之，在當時內政的荒謬、無知和法西斯的專制統治並不影響其外交關係的拓展。以中共的建交國為例，在七〇年代前與七〇年代後（到八〇年為止）的比例為一比二，即七〇年代為其以前的二倍多，七〇年代建交的有六十八個^(註二四)之多。這樣看來，以七〇年代來看：

第一：中共的內政與外交在七〇年時，其關聯性並不密切，因為在其內政二者是屬於不同的管理系統。

第二：馬列意識形態的國際主義和使命感，並不影響中共在對外關係上和其他非共國家的關係。

第三：至少在七〇年代期間的十年左右，中共內部的變化，並沒有引起鄰近國家的不安。

(三)意識形態退化時期—經濟外交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職務和職位，之後的一年鄧小平努力從意識形態到人事安排等各各領域擊倒固守

註二四：當代中國四十年紀事(一九四九～一九八九)虞實棠、李學昌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六月，頁五四四～五四六。

毛澤東思想的華國鋒，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終於掌握了所有實權，開始其挽救中共免于被人民推翻的新措施，此次會議中宣佈「今後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圍繞此一中心，一方面大力批評「兩個凡是」^(註二五)的錯誤，一方面進一步塑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輿論，以使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此後中共在內政工作首先推出「計劃管理體制改革」：即主張計劃調節和市場調和相結合，以計劃為主，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接著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強調「尊重生產隊的所有制和自主權，恢復和保護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以便復甦農業生產，富裕農村。另外在一九七九年也推出「稅制改革」，「外貿管理體制改革」，一九八〇年開始在東南沿海設置「經濟特區」，恢復「律師制度」，進行「教育改革」，一九八二年制定「新憲法」，推行「經濟責任制」，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一九八三年試行「利改稅」，建立「審計制度」，開展全大陸的財產檢查，一九八四年展開「鄉鎮企業」，推動「商業體制改革」，一九八五年開闢「長江」「珠江」及「廈、漳、泉」三個三角地區為沿海經濟開放區。一九八六年又推出「環渤海經濟區」，改革勞動制度，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一九八七年又提出「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構想^(註二六)，從以上的措施來看事實上是利用了「中國特色」為盾牌，大量引進資本主義的觀念、辦法，當然由於制度上矛盾，在引進改革的過程中，也發出適應困難，一九八八年的通貨膨脹、官倒、腐化，終於導至「八九民運」，「六四天安門事件」，而使中共「改革、開放」以來，辛苦塑造的形象大損，而使中共原來和西方已和緩的「意識形態」，又成為兩者主要矛盾，之後西方大國開始對中共一方實施經濟制裁，包括停止信貸、經援和各種合作計劃，一方面也實行政治封鎖，禁止高級官員訪問大陸或是與中共官員接觸^(註二七)，同時當時不少的外國專

註二五：「兩個凡是」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兩報一刊」正式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註二六：以上資料參考當代中國的十年紀事（一九四九～一九八九）虞寶棠、李學昌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家預期中共若不開放民主則經濟繁榮勢必倒退^(註二八)，而且也預期中共的「改革、開放」也終將停止，一切又會回復到七〇年代的保守作為。特別是「六四」之後的傳播一再強調「治理整頓，深化改革」^(註二九)的經濟方針，爲了防止經濟過熱，造成通貨膨脹而在經濟上實行三年的調整，更使得外人相信中共的「改革、開放」已經名存實亡。總之，八〇年末對中共而言是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最不順利的一年。不過總得來說，在整個八〇年代，中共在內政上的改革和特別開放已經逐步促使中共邁向國際，借由軍事大國的後盾，中共已成爲新興的政治大國。

回顧八〇年代中共的外交，則是在配合大陸「改革、開放」的需要進一步拓展其與世界所有國家的關係，以鄧小平的話來說「我們自己也確確實實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是假話，是真話，這不僅是符合中國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註三〇)，在此一基礎上調整了中共的外交，其核心爲：一是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經過綜合客觀分析之後，轉變了對戰爭危險估計過高的看法，作出了和平可以維護的切實判斷；二是轉變了外交戰略路線，不同任何大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註三一)。

在維護和平方面：一九七九年，中共與蘇聯開展國家關係的外交談判，鄧小平訪美、積極爭取恢復國際組織之席位，一九八二年趙紫陽訪非洲十一國，一九八三年胡耀邦訪日本，一九八四年邀請雷根訪大陸，一九八四年趙紫陽訪西歐，一九八五年李先念訪美國，加拿大，一九八六年英國女王訪大陸，一九八七年中越展開邊界談判，其中除一九七九年春和一九八八年春兩次與越南發生局部戰爭之外，基本上中共是力圖與世界各國保持友好的關係

註二七：參見星島日報（香港），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時報，七八年十月七日。香港時報，七八年十月十五日。

註二八：Frank. Gibney Jr, "Beijing Rising", Newsweek, February, 15, 一九九三年，頁八。

註二九：李鵬，堅決貫徹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方針——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日在七屆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

註三〇：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頁二〇五。

註三一：張光，八〇年代中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調整，北京：外交學院學報一九九二年一月轉引自北京：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外交，一九九二年四月，頁三四。

(註三二)，除此之外中共也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宣佈裁軍一百萬，並將大批軍工生產轉為民用生產，大批軍用機場、港口、鐵路等設施轉為民用或軍民合用(註三三)。

在不與任何大國結盟方面，中共有鑑于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現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共認為在八〇年代，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不同任何大國結盟，即不同美國建立「戰略關係」，也不同蘇聯搞「共同反帝」。堅定地站在世界各國人民一邊，為維護和平和促進發展而不懈努力(註三四)。

在此同時，中共也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和合作，不過這時中共也擺脫過去以金錢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做法，改以「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為原則，而在國際上鼓吹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不發達、南北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的種種限制造成的」。因此主張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主張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以促進經濟發展。

特別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數表示沈默，並沒有跟隨西方國家之後來遣責中共，因此在八〇年代的末期，中共反而和第三世界國家比較親近，最明顯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中共提出支持「巴解」的「中東五點和平方案」，也同時改善了中共和週邊國家的關係，李鵬也出國訪問南方的幾個小國家，擺出了友好的姿態。

綜觀八〇年代中共在外交上表現了以下的特色：

第一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進一步的弱化，特別在國際主義義務方面，已不是中共外交的主要考量重點，是以在整個八〇年中共在外交上不在有巨額的「援外」，例如孟加拉在七〇年末求助只得到十分之一的信貸(註三五)。

第二是「經濟外交」是為八〇年代以後，中共外交的重點，所謂「經濟

註三二：同註二六，頁五六五～五六七。

註三三：同註三〇，頁四～三五。

註三四：同註三〇，頁三七。

註三五：明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日。

外交」主要是因為中共推動「四化」，大陸的原料、市場、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來吸引外國的資金、技術，因此廣結善緣爭取外資，便是外交工作的重點。

第三是在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中，也從過去意識型態的反帝、反殖結盟關係轉為經濟關係的結合，一方面提出「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則，一方面支持「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以打破長期由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秩序。

第四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開始真正思考「獨立自主」的外交道路，而且有鑑於西方國家對中共「六四事件」的遣責，對民運人士的支助乃特別強調「和平共處」之原則^(註三六)，主張國與國的交往應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來決定國家關係，更不應該以此為藉口作為「干涉別國事務，侵犯別國領土」的藉口。同時也在此一基礎上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以進一步吸引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中東，回教徒國家的認同。總之，在八〇年代，我們發現中共在內政上的發展和其外交上的作法是互相有密切的關聯性，意識形態的淡化同時表現在內政和外交政策上。七〇年代的互相矛盾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

四「國家利益」外交路線

首先在內政上經過了「六四風波」之後，中共開始實行「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工作為期三年，在三年期間，個個戰線，都出現「左」和左的鬥爭，而思想保守的「左」派也多佔上風，改革派幾乎棄守所有的陣地，先是文宣、教育、意識形態，最後連「改革開放」也受到懷疑，因而促使九二年春鄧小平風塵僕僕的南巡為「改革、開放」打氣加油，佈置新人，終於形勢大逆轉，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改革派重新掌權，不但在實踐上進一步落實改革，甚至在理論上也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破了中共堅持了四十餘年的「計畫經濟」，以便為進一步大幅度的改革、開放作好

註三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理論的準備，除了最明顯的經濟改革之外，中共在自八〇年代開始的改革事實上是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其他方面包括了教育改革、法制建設、行政改革、黨的建設、科技體制的改革等等（註三七），在「治理整頓」時期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例如大學生上軍訓，加強社會主義教育等，這些在鄧南巡的帶動之下也都重新改正或全面停止，經濟的改革、開放確實帶來了中國大陸空前的繁榮和成長，整個八〇年代中國大陸的經濟特別是九一、九二年，成爲去年世界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註三八）

在外交方面：由於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在九〇年一開始中共的外交就不順利，在西方大國的抵制之下，中共高唱「反和平演變」的大旗，強硬地抵抗西方政府的不友好的敵視，另一方面中共善用本身的經濟籌碼吸引了台商、日商的資金以使大陸經濟持續發展，同時又利用被捕的民運人士作爲與西方繼續打交道的籌碼。一九九一年八月蘇聯經過政變而瓦解，中共也察覺國際形勢的轉變：首先是冷戰格局下的二元對抗已經轉爲多極中心。其次是經濟體系取代了政治體系，成爲下一世紀的重心。三是新的科學技術將是未來世界致勝的關鍵。四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十分嚴格的考驗。中共認爲在此時世界上各類的國家都會努力擴大自己國家的影響，提昇自己的發言權（註三九），同時中共也發現在多極中心的情況下，慢慢形成新的「一、三、五」格局：一超、三中心、五大力量。

一超：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其在軍事、政治、科技等方面仍居世界領先地位，而且擁有世界最多的核子武器，短期之內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超越。

三中心：在經濟方面，日本和歐洲共同體的經濟實力已對美國構成威脅，據「經濟合作組織」的報告，在一九九〇年美國、歐共體、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分別爲五三九一億美元，六〇一億美元，二九四二億美元，目前他們都

註三七：王洪模等著，改革開放的歷程，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頁三六四～四〇〇。

註三八：Bill Mellor, "A year for Crowing," Time, February 22, 一九九三年，頁十六。

註三九：章忠國，「對九十年代中國外交的思考」，合肥：安徽省委黨學報一九九二年一月轉引自北京：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外交，一九九二年四月，頁四一。

正在計畫形成以它們自己為核心的三大經濟區—北美經濟區、歐洲經濟區和東北亞經濟區。

五大力量：在新的國際關係中軍事力量和政治因素，自然還是不能忽略的力量，是以就綜合國力而言，（包括了經濟、政治、軍事和其他相關的潛在因素）美國、日本、歐共體（以德國為主）、俄羅斯和中共是為未來世界格局中的五大力量。（註四〇）

在此一情況下，中共早在九〇年底就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構想，其內容是：①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選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②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嚴格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③國家之間應當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和睦相處，平等相待，互利合作；④國際爭端應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⑤各國不論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世界事務。（註四一）

至於在新秩序中，中共認為在九〇年代的中國外交尤其應當突出表現其主動性和引導性，努力增強參與國際體系的能力，充分利用和把握中國與國際社會各角色聯繫中的外交機會，在國際新格局的形成和國際秩序的重建過程中為自己尋求最佳的位置。九〇年代中國外交的對策和運作，可在這幾個層次上展開；①繼續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②密切同亞太、周邊國家的睦鄰和友好合作關係；③處理好同西方主要工業國的關係；④充分發揮中國在聯合國中的“重要、獨特”作用。（註四二）

根據中共的想法，我們可以了解中共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是為了解其國際上的影響力；發展與亞太周邊國家的關係是為確保中共的經濟發展，擴大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以便與美國、日本在同一地區互相角

註四〇：黃庭燁、楊明杰，蘇聯巨變後的國際形勢，北京：現代國際關係，一九九二年一月轉引自北京：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外國政治、國際關係，一九九二年四月，頁九～十。

註四一：錢其琛，在第四十五屆聯大會上發言，北京：新華月報，一九九〇年第一〇號，總五五二期，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頁一五四。

註四二：同註三九，頁四一～四二。

力；處理與西方工業國的關係，目的在改善其國際形象，從而繼續從西方獲得技術和資金；在聯合國中發揮作用的意義，在於推銷和實現中共所鼓吹的「國際新秩序」。當然能否在九〇年代完成其外交構想是有待中共的努力和國際社會的變化。

由上述的作為來看，九〇年代才剛剛開始，中共在內政和外交處處呈現出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特色。

首先在內政上拋棄「計畫經濟」，在外交上也同樣體認「國際共產運動」的挫敗，因此一方面在國內進行「反和平演變」的教育，一方面則，仍強調與西方國家加強關係。

其次在內政上，鄧小平一再要求大陸在經濟上要更大膽放手去做，在外交上也構思如何利用本身的長處，在九〇年代建立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經濟區」，以便提高其國際影響力。

(五)中共外交與內政關係之簡析

第一：在過去的四十餘年中，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中共之內政與外交基本上是相互一致的，七〇年代在中共內政上是一個轉型期，在外交上也是一個轉型期，只是內政的轉型比較慢，在鄧小平手裡才逐步完成，而外交策略的轉變事實上是在毛澤東手中已經完成。兩者的差別只是時間表現的不同。

第二：從中共內政與外交關係來看；吾人以為從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中期，中共的外交的特點是「外交是內政的集中表現」，在中共建立政權的前廿餘年，一方面是中共施政的重點在於中國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所以外交只是內政的延長，是被動地服從於內政的需要，不論是五〇年代的「一邊倒」或是六〇年代的接交「窮、黑、小」朋友，甚至到「第三世界論」都是以內政上階級鬥爭模式的思考方式。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外交在中共政權建立的初期並不是重要的施政重點，同時在此一時期的外交可以說是純意識形態的外交，到了七〇年開始逐步轉為政治外交。七〇年代末期到八〇年代

起中共在內政上放棄「階級鬥爭」，改為「四化建設」這時中共需要外來的資金、技術，因此外交事務也在某種意義轉為積極的、主動的政策重點之一。換言之，在八〇年代之後中共內政是需要外交來支持，而內政的表現也直接影響中共外交工作的成敗，反之外交的成敗也直接影響中共內政的整合和其他需求。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趨勢之下，經濟外交越來越成為中共外交重點，同時中共也越來越擴大利用其經濟來增加自己的外交籌碼。

第三：從人事結構來看，在中共政權真正掌握外交大權，過去是毛澤東、周恩來，現在是鄧小平。在毛澤東掌權的時代比較強調純正的意識形態色彩，不過在周恩來的運作之下，中共的外交並沒有像內政的經濟建設一樣搖擺不定，相互矛盾。相反地反而能在兩大陣營中突出自己的路線，特別在七〇年代初技巧的轉向聯美制俄，更為中共奠下「大國」的基礎。鄧小平時期的外交在本質上受民族主義羈絆遠大於馬列主義，不論是經濟外交或是九〇年代的國家利益外交都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鄧後中共政權重大的外交取向，仍將不得不以國家利益為主導，則其外交政策也將不至有重大改變。

第四：中共在意識形態外交時期，中共對自由世界充滿了敵意，野心勃勃地認為可以在世界的廢墟中建立「社會主義天堂」。積極發展核子武器、發動中印戰爭，「文革」時期挑釁過中蘇邊界，對多國大使館、和駐華代表有過攻擊行動，對大陸內部更是高壓控制，無法無天。但是西方強權各亞洲國家對於這樣的中共反應則是比較冷淡，比較克制。到了中共推動政治外交時，更是一片中國熱，全球搶搭北京巴士，更不要說是譴責、撻伐，幾乎是完全遷就於中共。八〇年代的經濟外交又再一次抓起各國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熱，而大陸也因為大量與外界接觸，特別是經濟改革、開改的結果，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越來越淡化。八〇年代起中共開始將其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陸內部的事務上，一如鄧小平所言：「四化」是「反霸」和「統一」的核心工作^(註四三)，但是也就在中共以「國家利益」為其外交政策導向的同時，西方國家和亞洲的鄰邦反而再度起了「黃禍論」，「中國威脅論」^(註四四)等話

註四三：同註三十，頁二〇四。

題，明白地顯示西方國家對中共日益「富強」的不安^(註四五)，但是令人費解的是早先還讚揚中共經改是步上正確途徑的外國媒體^(註四六)，一下又開始咀咒中國。「亞洲週刊」在去年年底的文章道出了西方國家的憂慮，作者認為中共蓬勃的經濟發展現狀和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為中國大陸的「富強」及可能帶來的威脅擔憂，一場針對中共的「新冷戰」已經來臨。

貳、「新冷戰」形勢的浮現

「新冷戰」之出現肇因于美國提出的「中國威脅論」先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底出版的「商業週刊」指出：「中共近來積極自前蘇聯取得先進武器，將顯著提升北京干預遠超過大陸領土以外地區的軍事能力，美國高級官員視中共這種新發展為『壞兆頭』。

其次在同年九月出版的一期「新聞週刊」，指稱：「現在東亞的一些小國有了一項新憂慮，中共又再興起成為這個地區主導力量的野心」。更讓人感到憂慮的是中共購買新武器所帶來的攻擊能力。

其三為同年十月出版的「政策評論」月刊，刊出費城「外交政策研究院」亞洲部主任門羅，題為「睡龍之醒」的專文說：「中共在亞洲首度面臨著沒有嚴重威脅或敵手的局面，而它卻也是全球唯一在軍事上急刻擴張的角色。因此，後冷戰時期的今日，亞洲真正的危險乃來自中共」。

此後，世界新聞媒體以及各國政治領袖，對「中共威脅論」提出了更多說明^(註四六)，去（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的「亞洲週刊」也專文論述，縱觀美國對中共的憂慮，不外是：

註四四：a. 亞洲週刊（中文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威脅論，頁二二～二八。

b. 觀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言論，轉引自「瞭望」海外版，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

註四五：聯合報，民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註四六：China, Now On the right truck! 出處不詳。

註四六：a. 係引自大陸情勢週報一〇八四，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編印。

首先由於中共對西方而言失去其戰略同盟的價值：早在一九六八年秋捷克人民為反抗蘇共控制，團結爭取獨立，形成「布拉格之春」運動，接著布里滋涅夫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的主張，然後悍然出兵撲滅捷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願望，而西方國家除了口頭聲援，精神支持，聲討俄共，嚴重抗議之外，對蘇共的強勢作為完全不敢有真正行動，蘇聯對自由民主國家的威脅可以說達到空前未有的地步，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共則在中蘇邊境兩次挑起衝突，而蘇聯只是陳重兵于中蘇邊境，並沒有對中共出兵，這才使得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注意到中共是對抗蘇聯的「活棋」，又有利於美國擺脫越戰的困境，光榮撤退，所以「聯中制俄」的戰略自然成為當務之急，此後有季辛吉的秘訪，有尼克森的大陸之行，此時西方對中共專制統治的容忍完全是建立在此一戰略基礎之上，在西方看來只要中蘇邊境出現緊張，一個強大的中共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是有利的，直到一九九一年年底蘇聯瓦解，新的俄羅斯雖然仍有原來蘇聯百分之七十的土地，百分之五十八的生產力，以及為數不少的高科先進武器，但是十分重要的是俄羅斯總統葉爾辛願意全盤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願意「聽命」美國，與美國在國際事務合作，經過一年的事實證明，葉爾辛是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行民主制度的唯一希望，因此冷戰可以說是真正結束了，那麼「聯中制俄」的策略也自然沒有必要，這時西方國家認為蘇共已經垮台，中共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垮台，才能吻合西方的「願望」，不然的話中共也應該順應世界潮流，進行政治改革接受西方民主，人權的思想，偏偏中共並沒有在西方的經濟制裁之下垮台，更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這才使得西方國家開始擔心在下一世紀西方國家是否必須面對一個相當「富強」而且人口極為龐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顯然對付一個「富強」而且兵源充足的「社會主義」國家，肯定比對付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指蘇聯）要困難得多。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可以說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自然蘊育而生，先是有紐約時報所提倡的「撕裂中國」（Breaking China apart）之議，繼而西方國家就努力地來配合此一目標，這一點我們可以特別從達賴在西方國家受到日隆一日的禮遇^{（註四七）}，可以看出美國的用心。總之，美國是不願急見到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現。

其次是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自七九年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兩岸和平統一出現曙光，八七年底之後，雙方互動日熾，交流頻繁，而民間關係日趨緊密，假如沒有其他因素，兩岸的中國是真有統一的希望，兩岸「統一」對美國和亞洲鄰近的國家而言，自然不是「好消息」，因為即使我們不去計算統一對中共在經濟上所獲得的效益，即從政治上來看它代表中共的「家務事」已經完全解決，完全沒有後顧之憂，之後中共自然可以專心於外務的發展。在這種的情況下，中共的綜合國力可以說提昇了若干倍，因為中共可以充分掌握使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民族感情，加上中共善于使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來動員群眾組織群眾，這種力量一旦用之於對外，自然是一股極為可怕的毀滅力量。換言之，台海緊張關係的和緩是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但是「統一」是不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因而適度地維持兩岸之間的「武力均衡」是制衡中共必要的手段，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六四」事件之後，我們的政治地位在微妙的轉變之中，採購武器乙事也似乎順利得多（註四八）。此種對台灣有利的國際形勢必然會與中共的「強」大成正比，與西方國家對中共的需要成反比，此種需要是包括對中國大陸市場的經濟需要在內，當然最理想的情境是兩岸中國人的錢都能賺。不然至少也能賺一邊，所以只有中國分裂的情況下，西方在這一場對中國的「戰爭」就只是一場多贏或少贏的「戰爭」。然而，一個統一的中國，則就可能是贏或輸的選擇，此一形勢對日本也是完全適用的。

其三對中共軍事大為擴張的憂慮：依據美國的說法，中共從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二年之間軍事支出分別增加百分之十、十五、十二（註四九），蘇聯瓦解之後，經濟困難暴露無遺，於是開始以賣蘇聯高科技軍事武器來增加收入，中共正是這一方面的大買主，華盛頓郵報指出俄羅斯已在今年初開始運交一中隊廿四架蘇愷格廿七型先進戰鬥機給中共，並另外接獲兩中隊蘇愷廿七型

註四七：聯合報，民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註四八：同註四四a，頁二二。

註四九：青年日報，八十一年九月六日九〇年為二九〇億，九一年為三二五億，九二年為三七〇億。

戰機的訂單，雙方還簽訂合同，將由莫斯科提供中共兩中隊的米格三一型先進攔截機，以及若干T-七新型坦克，另外紐約時報也列出詳細的清單（註五一）證明中共軍事武力的擴張，同時中共也積極研發自製高科技武器的能力，如垂直起降戰鬥機和中距離彈導飛彈；而中共海軍的擴張更是引起注意，根據楊尚昆的說法中共擴建海軍的原因是：一、南沙群島情勢並未穩定，二、雖然中共與越南關係已正常化，但是要河內放棄對這些島嶼的主權並非易事，三、中共海軍軍力目前並不足以守南沙群島。（註五二）然而西方國家似乎更注意中共海軍司令員張連忠的說法：中國海軍走向大洋練兵是幾代人的願望（註五三），今年（一九九三）三月中共的企圖心十分顯露地展示了新的F-一二二巡防艦（註五四）。顯示中共已具有遠洋打擊的能力。

有趣的是在俄羅斯賣完武器之後，又大聲警告西方國家：中共的提昇國防力量近可威脅亞太地區，遠可參與國際事務行動，使世界的軍事均衡出現

註五〇：轉引自聯合報八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註五一：聯合報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資料：中共最近頻頻傳出購得或即將購得一些尖端的海、空武力裝備，其中包括：

- 一蘇愷二十七（SU-二七）長程戰機。蘇愷二十七，類似於美製FA-一八黃蜂式戰機，是種多目標的戰機。
 - 一中共向獨立國協洽購蘇愷二十四攻擊機，該攻擊機是蘇聯空軍在六〇年代末發展出的長程戰鬥轟炸機，其功能與美製F111相近。
 - 一米格三十一。該機是蘇聯因應美國將巡弋飛彈裝配在B-五二轟炸機，以及其後美方發展的B-1B轟炸機所研發出來的戰機。這種長於低空狙擊的防衛機，配有先進雷達系統，可同時追蹤十個目標。
 - 一中共自烏克蘭購買的瓦亞哥級攻擊式航空母艦。該型航艦可裝載十二架蘇愷二十七、十二架米格二十九戰機。同時也可以配製蘇愷二十七型戰機。
 - 一今年初，美國政府透露，以色列已非法將愛國者飛彈的技術轉移給中共。
- 此外，以第二炮兵（二炮）為主的戰略飛彈部隊，配有東風五號、四號與三號等各型戰略飛彈約一百枚。

註五二：中華日報，民八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註五三：同註五十。

註五四：聯合報八十二年三月二日。

- a.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現狀和留勢以及由此點可能導致的各種影響與文化，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播出。

未可知的變數^(註五五)，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日本對此也深感憂慮^(註五六)，其實在武器方面還有一個令西方國家更不滿意的是中共是世界高科技武器的供應者^(註五七)，在以前中共曾將蠶式飛彈售予伊朗，中共又將新研發Type四七快速攻擊艦提供波斯灣市場^(註五八)，最近又傳中共將核武設備售予巴基斯坦^(註五九)。這些國家都是回教國家，也都是反美國家，所以美國對此特別敏感。

其四是中共的經濟發展已經成為西方國家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一九九二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二兆三千九百卅八億元，比前年成長一二·八%，顯示大陸經濟高速成長^(註六〇)雖然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經濟九一年成長百分之十二是一種偶然。經濟看來過熱，原材料短缺、通貨膨脹上升，所以中共的經濟成長也正在減緩成長速度。但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即使九三年發展速度減慢，在今後十幾年內，年成長率會維持在百分之六到九之間，如以年成長百分之九計算，經濟產值每十九年就會擴大五倍^(註六一)。他們說：如果以實質購買力作為比較的基礎，中國大陸可能已經是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僅次於美國。雖然可以對此作完全不同的解釋，但這種統計數字顯示，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或許大陸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同註六二），有些比較保守的學者認為上述的觀察是過份樂觀，不過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評估也指出中共經濟到公元二千年為止，平均每年可以百分之七成長的話，屆時中共的經濟規模會躍居世界第三、四位^(註六三)，如此一來使得過去認定的「世界將形成三大貿易

註五五：中國時報八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註五六：同註五十。

註五七：中國時報八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五八：同註五四。

註五九：聯合報八十二年五月九日。

註六〇：經濟日報八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註六一：聯合報八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註六二：彼得·斐迪南，「二十世紀的中國與國際合作」，中國時報八十二年四月五日。

註六三：鮑爾·葛魯曼「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是禍？是福？」，自由時報八十二年四月六日。

國」的構想將爲之動搖，因爲，中共經濟規模之大，不可能併入日本爲中心的東亞貿易圈^(註六四)，事實上外國的專家已經指出，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亞洲四小龍維持經濟成長的原因，主要是拜中國大陸強勁經濟帶動之賜，大陸有取代日、美成爲亞洲經濟火車頭之勢^(註六五)，但是在美國看來，目前中共的一切優勢，都是未來世界不安的根源，中共未來的演變究竟如何呢？自然令人關切。

參、九〇年代中共內政措施及其穩定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共召開「十四大」，一九九三年三月中共又召開第八屆「人代會」和「政協」會議，這是中共九〇年代兩次極其重要的集會，從大會的內容來看，中共希望透過這三個大會解決以下的問題：

第一：跨世紀接班人的問題：目前跡象是中共的老人進一步交班，建立以江澤民爲核心的分工領導制。其重要職位分配如下：^(註六六)

江澤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下稱「常委」）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李 鵬：常委，國務院總理

劉華清：常委，軍委副主席

朱鎔基：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喬 石：常委，人大委員長

李瑞環：常委，政協主席

胡錦濤：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第二：確定未來的發展路線：中共在其黨的「十四大」中確定以「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爲「組織路線」，而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爲「政治路

註六四：聯合報八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註六五：同註六一。

註六六：王玲玲，中共政權機構人事改組，中國大陸研究，三十六卷五期，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八十二年五，P.17.20。

線」(註六七)，在「人大會」上更因此而修改憲法(註六八)，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合法性，在黨和政全力推動下，中國大陸已掀起前所未有經商大潮，從而促成大陸經濟高速度的成長。

第三：改善黨的領導：自從「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政權的形象大大受損，加以共產主義在理論與現實的落差，以及共產黨各各幹部道德的隕落，使得共產的統治基礎開始動搖，然而中共卻不希望因此而失去權力，故而希望透過大會來確定法制的建立、道德的提昇、監督的強化、效率的提高以及精兵簡政，機構改革，公務員制度之推行等手段來改善黨的領導(註六九)。

就客觀而言，上述的三次大會已經現實地提出問題，而且試圖在影響中共政治地位最小的情況下基本上提出解決問題的大方向，而且是在共產黨目前所能忍受的最大幅度的改革，當然誰也不能斷言此一改革會有什麼結果，不過基本上我們可以同意此一改革的方向大致是受到大陸社會的支持，因此九〇年代中共的內政變化大致是有軌跡可尋的。假如情況一如目前的發展，一般人則有下列的幾種看法特別引起外在的關切。

第一：是接班的問題：大家都同意目前中共的政治最高的決策權仍是在鄧小平手中，他是目前這些領導的主要支持者，特別是江澤民、朱鎔基、李瑞環三人在中共政界的資望條件等並不是無可挑剔的，一旦失去鄧的支持情況將會如何，在此一問題上猜測的範圍是：

最悲觀的說法是江澤民一如當年的華國鋒(註七〇)。

最樂觀說法是只要政策對頭，江澤民應該可以順利接班(註七一)。

以上兩種的看法有一個共同的結論是，江澤民在鄧後能作的越久，地位

註六七：年佳，對中「十四大」修改黨章研析，中共研究，二十六卷十一期，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P.19。

註六八：參中國時報，八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註六九：同註六六。

註七〇：同註六五，P.15。

註七一：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後政治動向，中國大陸研究，三十五卷十二期，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八十一年十二月，P.13。

也越穩固，然而事情的發展可能是：在鄧後由於「改革開放」的政策基本上全大陸人民都是不同程度的得益者，社會上沒有立刻發洩憤怒的環境，同時中共也基於統治權力的需要，因此短期內（約半年至一年半左右）江澤民政權是穩固的，但是由於改革、開放、經商大潮不斷的邁進，他必然迫使中共必須做新的反應——也就是要求中共作出更大膽的改革，此時才是江澤民的危機產生的時刻，因為屆時以江的資望、人脈都不足支持江提出新的構想，從而才會加重江澤民的危機，因為在中共歷史中來看每一次面臨理論和政策的重大轉折所憑藉的常常是領導者個人魅力^{（註七二）}，而不是集體的同意，這時除非江澤民能有足夠的實力，否則進一步改革就有造成黨內失和、鬥爭的危機，不改又有政權統治的危機。這時也正是外交上必須注意的時候，中共是否以外交事件，外交作為轉移內政的困境。這是值得觀察的情況。

第二是市場經濟造成的多元影響：自一九九二年春天鄧小平南巡以來，改革派實力大增，並在中共「十四大」中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帶動了九〇年代中國大陸的「商品大潮」，但是市場經濟的結果，決不止於經濟的效應，同時會引起社會和政治的效應，面對這些發生在大陸內部的效應，也將深深地影響中共的對外政策，從而對東亞地區也構成影響。例如在市場經濟的執行，如果目前經濟學者預測的十分樂觀的話，未來中共是否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大陸市場」視為一種軟性的武器，以影響、牽制東亞國家，又為市場化之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中共黨從事政治改革的意願所造成的緊張，此一緊張對參與大陸市場的東南亞國家又必然產生若干影響，這些中共如何解決呢？在社會方面也是同樣會因為經濟的發展造成社會結構、社會趨向和社會自主性的變化，從社會結構來看：由於改革開放，打破既有的生產體制，使得每個人因職業帶來的束縛從而打破，社會結構也將從安定的職業為主的結構體系，轉變為追逐生活為主的結構體系，所謂以生活為主

註七二：如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九七〇年代中共外交政策的大逆轉，都是毛個人決定之後再交由中共黨政部門加以執行，雖然有人不同意；但也不敢與毛對抗。

註七三：如一九六二年的中印之戰，一九七九年的懲越戰。

要是指一個人的收入結構轉變反應為生活而忙碌被生活所束縛的現象，從前者來看中共控制了職業就控制了人控制了社會，後者的現象就不是中共所能控制，此時社會仍然趨向多元化，則原有的一元體系也被打破，換言之，中共政治對社會的控制也將逐步削弱，而且在許多層次社會也會脫離政治的控制，反過來利用政治為社會服務，屆時中共將為如何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之後所帶來的社會變遷，以及社會成長之後對政治所構成的挑戰，甚至是威脅呢？如果順勢發展，中共就不可避免地必須邁向中共所反對的「民主政治」之途，反之政治和社會衝突有驟，這裡不論是何種變化，大陸社會均將面臨一個浮動不安的年代，一個政局不穩定的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自然是一種不安的威脅。

第三：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是另一個值得關切的重點：自從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共與地方的關係已經從領導、指揮命令的關係中出現微妙的轉變^(註七四)，八〇年代初為搞活經濟，中共中央逐步下放一些計劃，以改變過死的，不利地方發展的現象。然而地方經濟活躍之後，中央對地方控制力也相對削弱，特別是在財稅的劃分和支援上，由於地方對中央「貢獻」的不同，因此影響中央決策以及受制於中央的程度也不同，長遠來看，中央領導地方的關係不會完全改變，但中央也不能忽視地方的自主權，特別在經濟利益上更是有所顧忌，換言之，「協商」方式將成為若干地方與中央新的關係帶，但是此種「協商」關係必然就隱含了未來可能的衝突，矛盾甚至公開對抗的可能性，屆時中共是以「新憲法」來整調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或是以軍隊介入地方事務恢復高度的中央集權，或是中央轉趨弱勢，中國邁向聯邦？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是地方在經濟的外事權上已經有所增加，地方和地方之間的財政和其他權限的衝突也在增加之中，這些都將為未來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增添變數。究竟如何變化，而在變化的過程對鄰近諸國的影響又如何，都值得觀察。

註七四：楊開煌，十四大後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動向，中共十四大後之政經趨向與我因應之道研討會，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主辦（一九九二年十一月，PP.13~14）。

第四：中國大陸的人口因素在未來也是一個爆炸性的因素，目前中國大陸擁有十二億人口，在中國現有土地上確實是擁擠不堪、生活的水準、品質也很差，而且仍在持續惡化之中，在開放的衝擊之下，增加了中國人對外的了解和認識也逐步提高，於是在生活的誘惑下（有的人也是生存的不得已）紛紛偷渡，台灣固然深受其害，而日本、美國等環太平洋富裕的國家也無不深受其苦，前瞻未來中國大陸人口仍在持續增加，中共也採取了嚴格一胎化措施，不過此一增加的趨向仍未和緩^{（註七五）}。換言之，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陸出來的偷渡客肯定也會增加，假設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上遭遇嚴重的問題時，中共是否為了解決自身的難題而開放人民離境，則奔流出來擁向世界各國的人，就會是其他各國的而要承擔的困擾，所以就中國大陸人口問題，也將是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發生爭權和衝突的潛在因素之一。

總之，九〇年代中國大陸內政的變化之因素很多，任何一個因素所牽動的內部變局均將產生其外部效應。所以環太平洋的東亞國家也將本乎自身的利益，考量對中國內政變化因應之道。

肆、中共當前的外交努力

（一）消除威脅論

從西方的觀點來看，對「中國」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情感，他們既害怕中國出現政治、經濟的大動盪，從而產生全球性的「黃禍」，而目前唯一能約束中國人民的只有中共政權，但是他們也害怕中國成爲一個「富強」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他們最佳方案是幫助中共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經濟，透過經濟轉變其政治，尤其是改變爲意識形態，特別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和平演變」之心更切，現在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否會給中國大陸帶來一個更民主的社會？以往東亞各國的經濟顯示，繁榮和經濟多元化，最終將可能導向政治上的多元。在短期內，中共似乎有能力讓嚴峻的政治壓制和經濟起飛奇蹟兩者共存。

註七五：何博傳著，山坳上的中國，香港：三聯書局，一九九〇年十月，P.362。

更嚴重的是，中共在「十四大」和八屆人大」所作的努力似乎有意思將此一共存的現象堅持的發展下去，究竟這一場新的「冷戰將如何發展，我們無法預料，不過中共在外交剛剛調整為「利益外交」導向之時，中共似乎不願意國際間有這種印象，而妨害了內政的需求，因此面對「中國威脅論」錢其琛的說法^(註七六)是「防止世界動亂是各國共同的利益，但是每個國家本身存在的問題，不應成為發展相互關係的障礙。」換言之，經濟層面大家合作，政治層面各管各的。至於年費增加的問題，錢其琛的說法是在一九八五，中共軍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去年是百分之一點六，今年估計為百分之一點五。其次，中共的軍費人均只有約六美元左右，美國一千一百美元，日本是三百美元。因此，錢其琛強調，中共的軍費水平是很低的，完全是用於防禦的。所以中共認為「威脅論」的說法完全是軍火工業為了尋找市場促銷商品的輿論而已，有的日本人同意錢的看法^(註七七)，至於東南亞鄰近的國家雖然有的表示憂慮，如印尼^(註七八)、越南等國，但也有的國家表示中共不可能以武力解決問題如馬來西亞（同上註），大部份的亞洲國家喜歡和中共面對面接觸，而不願對「威脅論」採取一致的態度^(註七九)日本則對此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朝日新聞的軍事評論家田岡俊次認為，大陸軍費所反應的只是通貨膨脹，日本防衛廳的研究也認為中國海軍真成強大恐怕是進入廿一世紀若干年後的事。一位日本的分析人士也說「亞洲各國應相信自己的情報，自己進行分析，不能盲目相信外國人」^(註八〇)，這裡所說的「外國人」顯然是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人甚至認為「中共越富裕就能成為日本的巨大市場」^(註八一)換言之，日本是樂見一個富裕的大國，澳洲也認為「與北京

註七六：中國時報八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註七七：中國大陸軍事實情引起情報，亞洲週刊（中文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頁二五，引用日本人的分析說：中國擴軍的傳說，實際上來自美國。冷戰後，美國不得不縮減駐歐洲和亞太地區軍隊，它的軍火工業至少將增加二百五十萬人失業。在這背景下，美國將亞洲看成新的軍備競爭舞台。

註七八：同註四四a，頁二五。

註七九：Allen Whiting 亞倫懷丁中共向西方澄清「中國威脅論」忽略亞洲鄰國，中國時報，八十二年五月三日。

註八〇：同註六二。

關係主要從經濟利益出發，不會以美國為馬首是瞻」^(註八二)，換言之，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市場在亞洲是有限的，尤其在東南亞的地區「中國威脅論」的觀點多半懷疑^(註八三)。總之，一方面是尚無威脅東南亞各國的客觀環境事實，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努力排除東南亞國家的猜疑：特別在最具爆炸性的領土問題上中共一方面重申主權，一方面也強調非武力的誠意，中共外長錢其琛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表示：「在中國擁有對南沙群島主權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和有關的國家商量，來共同開發南沙群島」。我們相信，通過耐心地協商，南沙問題終歸能合理地和平解決^(註八四)。中共還提醒東亞國家注意中共在過去解決土地糾紛的辦法，以使南沙群島相關的國家安心。

然而無論如何中共在現階段確實是積極地改變過去革命游擊作戰的傳統經驗，努力地更新軍備、精減人員、調整戰略、提昇戰力，以便成為下一世紀的軍事強國，中共是亞洲的大國，特別在冷戰結束、蘇聯瓦解、俄羅斯本身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中共並沒有立即而明顯的必要性。擴張其軍事、提昇其武力，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似乎沒有絕對的理由。總之，以中共目前與鄰近諸國尚有若干領土的衝突和爭執，特別是中共仍是一個「人治」的社會的情況下，其軍事擴張行動必要成為中共強硬外交政治的後盾，因此也確實為未來的東南亞局部帶來潛在的不安因素，其動向究竟如何，自然十分值得我們關切。中共單方面的否認未必能完全消除我們疑慮。

註八一：同註四四a，頁二七。

註八二：同註四四a，頁二八。

註八三：狄昂照，中國國際競爭力僅屬中等，在本文中舉出亞大十五國本地區的國際競爭力比較，中國名列第六，在日本、香港、南韓、澳大利亞，新加坡之後，當代月刊（香港），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五日。

註八四：金德湘，「新強勢下，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係引自北京：人民大學出版資料中心，中國外交，一九九一年十月，頁四六。

註八五：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爭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公報。

(二)努力邁向有實力的政治大國

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共一方面慶幸大陸先推動經濟改革，因而避免解體分裂的危機，另一方面中共地更警惕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經濟發展與和平環境是互相連繫的，和平環境的維持又和中共自身強大相互為用。為此中共在內部條件上提出，發展經濟、提昇人民生活、提高科技力量和建立效率政府方面、在黨、政、軍人事佈局方面、在吸引留學生回國方面、在精簡機構等方面都是為了充實其政治大國的內部條件。在外部因素，中共的學者建議（註八六）：利用謀略、彌補自己經濟實力的不足，要注意利用各大力量的中心矛盾，以便形勢發展能對我有利，堅持自己的原則，在國際事務中依照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理解來主持國際正義，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處理些大國的關係，聲援第三世界國家，支持他們改變現有不合理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的要求。在處理亞細亞國家關係上，大共學者認為：「進入八〇年代，中國是四周無戰事，周邊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形成的敵意氣氛正一掃而光；大動干戈，互為敵人的時代已成爲了歷史，與所有的周邊國家都已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但是，我們還要清醒地看到，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還存在著大量的領土糾紛，如中俄、中印（度）、中越、中國和東盟大部分國家之間都存在著領土上的爭議，涉及的利益較大，在一個較短的時期裡恐難找到一個雙方都完全滿意的解決方案。對此，我們一方面要珍惜目前得來不易的周邊穩定局面，另一方面又要採取靈活性和原則性相結合的方法，穩定、慎重而不失原則地處理好這些糾紛，以表明我們的態度。在我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要避免使這種糾紛明朗化、擴大化，避免使之成爲國際新熱點」。總之，進入九〇年代之後，中共的國家戰略方針是「立足亞太、團結南南、放眼全球」。（註八七）綜合不斷的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政治統治，再輔以廣大市場的誘惑

註八六：郭煥成，九〇年代的中國國際地位，濟南：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一九九二年二月，轉引自北京：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外交，一九九二年八月，頁四七～四八。

註八七：蔣彩華，論世界格局重建過程中我國基本的外交戰略方針，轉引自北京：人民大學出版資料中心，中國外交，一九九二年七月，頁三四。

和相對克制而獨立的外交策略，中共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確實在進步提高之中，而且目前在中共內部經濟建設上雖然還存有或多或少的爭議，但在外交政策的層面，顯然沒有太多的爭議，事實上在目前國際共產運動處於較低潮（用中共的說法）的時代，在外交上也只能如此，因此我們以為這一部份政策將不致因為鄧小平或陳雲的生命而有太大的影響。未來的發展只有越來越強調其「國家利益」，前瞻未來中共有可能進一步以經濟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也以之作為邁向政治大國的後盾。

結 論

第一：在過去的四十餘年中，中共的外交政策也經歷過多次的變化，從最初廿年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取向逐步調整為政治外交、經濟外交、國家利益外交，每次的調整都對世界政治產生不同的衝擊，但在內外因素的交互影響下，九〇年代的調整是最令人矚目，也最讓西方國家疑慮的，因為中共經過八〇年代的經濟改革，九〇年代的經濟成長，卻遲遲沒有出現相應的政治改革，這使得西方國家擔心是否在蘇聯瓦解之後，他們仍然必須面對另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而西方的擔心又不祇是中共「富強」的問題，也擔心中共一旦瓦解所引起的全球性「黃禍」的問題，然而中共卻在外交上充份的利用了這個矛盾，獲得更大的活動空間和更高的發言權。中共的國際地位和影響也隨之提昇。依目前的形勢來看，中共已經逐漸在外交上形成了屬於自己的一套戰略觀點，正計劃以其日趨擴大的經濟規模作為磁石，不但牢牢的吸著週邊的國家，而且也擴大其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就可預見的未來而言，此一趨勢是不易阻止^{（註八八）}，無怪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有所顧忌，然而我們以為即使如此，我們一方面仍必須看見中共政權本身也不是一層不變的，三年前沒有人會相信中共會放棄「計劃經濟」，五年前也沒有人會相信兩岸會舉行對等的會商，事實證明經濟能產生效應往往超過經濟本身所能

註八八：聯合報，八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面對的；另一方面中共也應在變局中體察變的趨勢，從內政到外交不祇以言論^(註八九)特別是應以行動來證明中國的富強是有利於世界和平、有利於人類進步的，讓「中國有益論」「黃福論」成爲大家的期待和希望。

第二：站在台灣的立場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面對中共全球性的戰略，我們戰略何在，假如我們的戰略結構是「南聯，北進，西和」的話，似乎與中共的戰略有相當的重疊性，以南聯爲例，是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和南半球的巴西、紐、澳等國的合作關係，顯然這還是一著重經濟外交甚至是投資外交的構想，結果在未來的數年中，會不會變成我們的投資和中國大陸的市場都是這些國家所需要的，屆時我們的努力能在外交上有多少收獲呢？以此進爲例，除了俄羅斯之外，我們對日、美只是依賴，似乎不存在太多自主性的進退問題，而日、美兩國與台灣的關係，一直到現在爲止還是放在他們的「中國政策」下思考，而唯一可以平行合作的是共同對中國大陸進行「和平演變」，而此一策略目標的達成又決定於我們的「西和」政策，然而如果「西和」是求和的話，那麼這種也是不可靠的，沒有保障的，所以「西和」應以「西進」爲基礎，逼使中共不得和，所謂「西進」是進一步與大陸進行交流，進一步去團結大陸人民，進一步影響大陸人民，沒有「西進」的計劃，不可能有「西和」的結果，沒有「西和」的結果，就很難實踐「南聯」、「北進」的構想。

註八九：瞭望（海外版）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Diplomatic Policy of Communist China

Kai-Huang Yang

Before the age of eighty, Mainland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was influenced by Marxism-Leninism, then emerged "leaning to one side"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anti-hegemony diplomcy" etc. After the age of eighty, Mainland China practiced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under the consequence of its which result in "econom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interest diplomacy." The problem is Mainland China is back to normalcy the western world is beginning to worry whether this would be "yellow-fortune" of "yellow-peril."